

THE SCHOLAR
第10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文子人

文子

人

学人(第10辑)

主 编:陈平原 王守堂 汪 晖
责任编辑:朱建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大学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500,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80-3/I·931

定 价:15.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学术史研究笔谈

- 学术史的时代…… [日] 伊藤虎丸 (1)
近思录…… 王元化 (33)

半部学术史 一篇大文章

- 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 陈平原 (43)
论晚清佛学复兴…… 葛兆光 (89)
礼教与革命中国…… [日] 沟口雄三 (121)
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莫立…… 刘梦溪 (141)
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
——斯文自有千秋业…… 王永兴 (165)
读陈寅恪《四声三问》…… [日] 平田昌司 (197)

- 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王德威 (219)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日] 木山英雄 (239)
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
…… 汪 晖 (271)

被遗忘的微旨：王弼的《老子》解释学

- …… [德] R. G. 瓦格纳 (313)
裴颢是否著有《贵无论》…… 汤一介 (345)
禅宗所传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传统…… 王邦维 (351)

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罗志田 (367)
明清之际作为话题的“建文事件”	赵 园 (401)
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	夏晓虹 (429)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	邓正来 (471)
日本古代短歌诗型的形成与中国文化	严绍璜 (511)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辨证 (史部)	孙 猛 (541)
日本学者怀念王国维	(571)
回忆王静安君	狩野直喜 (572)
追忆王静庵君	铃木虎雄 (579)
忆王静安师	神田喜一郎 (584)
王先生的辫发	青木正儿 (587)
追忆与王静庵先生的初次会面	青木正儿 (590)
作者简介	(593)
编后记	(597)
《学人》致读者	(598)
《学人》1—9 辑目录	(599)

Contents

Discussion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Learning

The Epoch of Studies on Academic History

..... Itō Toramaru (1)

Recent Reflections on Studies Wang Yuanhua (33)

Self—Descriptions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 Chen Pingyuan (43)

The Revival of Buddhism in Late Qing ... Ge Zhaoguang (89)

Traditional Rites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 Mizoguchi Yūzō (121)

Wang Guowei and the Founding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hip

..... Liu Mengxi (141)

The Sources and Fundamental Ideas of Chen Yinke's
Historiography Wang Yongxing (165)

A Note on Chen Yinke's *Si Sheng San Wen*

..... Hirata Shōji (197)

-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David D. W. Wang (219)
-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s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Revolution”
 Kiyima Hideo (239)
- Local Forms, Dialects, and the Debates on “National Form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ng Hui (271)
- Forgotten Pointers: the Technique of Wang Bi's *Laozi* Commentary
 Rudolf G. Wagner (313)
- Did Pei Wei write *Gui Wu Lun*? Tang Yijie (345)
- The Indian Origi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han School's Patriarch Tradition
 Wang Bangwei (351)
- The Five-Zone System and the Ancient Perception of Tianxia and Zhongguo
 Luo Zhitian (367)
- The Topic of “Jianwen Event” i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Ming and Qing
 Zhao Yuan (401)
- The Death of Qiu Jing in the Eyes of Late Qing People
 Xia Xiaohong (429)
- Reflections on the Autonomy of China's Social Sciences
 Deng Zhenglai (471)
-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Ancient Short Poems and Chinese Culture
 Yan Shaotang (511)
- Textual Criticisms on the Ancient Book Catalogues of China in Japan
 Sun Meng (541)

Memories of Wang Guowei Cherished by Japanese Scholars

..... Kanō Naoki, Suzuki Torao, (571)

Kanda Kiichirō, Aoki Masaru

学术史的时代

伊藤虎丸

前 言

把我的学术史笔谈献给《学人》杂志，
以作第十辑出版的贺辞。

《学人》杂志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创刊以来，为许多优秀的论文提供了发表的园地，这次得以看到第十辑的《学人》，可贺之至。一位《学人》的读者、日本的学人，在写给我的信里说：“这本杂志是历来诸项目中学术合作计划中质量最高的。”我，作为衷心支援这本杂志的日本方面的一名《学人》之友，首先要向在五年里为维持这本杂志的高质量而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的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三位主编先生和日本方面的编辑合作者尾崎文昭先生，向大力协助他们的各位作者，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学人》第一辑卷首，登载了主编陈平原、王守常二位为首的诸人的《学术史研究笔谈》，卷末则刊登了于一九九〇年五月以及一九九一年三月由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得到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资助而召开的，题为“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日语的）。《学人》由此而创刊。我觉得这两个内容象征地表明了这本杂志的发刊宗旨。也就是，第一，表达

了诸位同人的“学术史”高度的识见以及对此问题的关心；第二，这种识见和关心的广度不止于国内，而欲通过学术上的国际交流，加深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知识人之间的、超越国境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这个看法或许没有错吧？如果，这本杂志的宗旨正在于此，我举双手赞成！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学术史与文学史、思想史一样，是人类精神史的一环；目前，我们正迎来了一个必须从人类精神史的意义上进行学术史性质的反省的时代。因此，我想借编辑部为纪念《学人》第十辑的出版而向我征稿的机会，承取第一辑卷头《学术史研究笔谈》之旨趣，不揣冒昧，回顾一下我本人的“学术史”，以代贺辞。

谈什么自己的“学术史”，这件事本身就让我感到羞愧，而且，想写的内容也至为贫乏。把“学术”与“史”分开来讲，先讲“史”的话，我的学术史（研究履历）大略与日本败战后的五十年间的思想史相重合。对于我来说，大致可把这五十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我的课题是“政治与文学”。第二个阶段是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过激派时期。我的课题是“科学与文学”。第三个阶段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战后民主主义的平等主义暴露了它的弱点的时代。我的课题是“文化”或叫“科学与宗教”，用鲁迅早期的表达方式，可称作“精神界的战士”的“心声”与“朴素之民”的“白心”能否相汇合的问题，或称作西欧式近代理性与亚洲式的底层民众的情念对立的问题。

其次，如果可以称之为“学术”的话，我想写的仅仅是极为基础的学习纪录。介绍我在这五十年里，我把上述的各个课题写成各篇论文的动机，同时，阐明我是怎么学习和理解“西方近代学术”的基本性格（即近代的“知”的构造）的。换言之，是试图说明我是怎么思考作为近代科学的学术与前近代儒教文化时代的学术之差异的。

（一）文学·近代·中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我是旅顺工科大学的学生，十九岁。八月十二日，投降前夕，我被征用入伍迎来了败战。值得庆幸的是，我立即解脱了兵役，在旅顺、大连渡过了两年的难民生活后归国。那时，我曾又一次燃起了重读工科的热望。可惜的是，那热望被从大陆带回来的肺结核病粉碎。经过六年的疗养之后，在一九五三年，当我能再次进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放弃了理工科的志愿，选择了现在的专业。“我的学术史”就从此开始了。从那时到今天，我的个人的历史，可以说正和战后五十年日本思想史相重合。

战时，我之所以选工科为志愿，是因为听从父训。父亲说：“日本在技术方面劣于美国，你就用技术服务于祖国吧！”战后，我自己选择的专业是“中国近代文学”。这个专业，由“文学”、“近代”、“中国”三个词组成。现在，回想起来，这三个词里，吹进了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的“时代之风”。我之所以弃“工”（原打算学应用化学）入“文”，其原因，既有学文学费用较省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认为那时候的“文学”（几乎就是指“近代文学”），同十九世纪的德国的“哲学”一样，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贵的衔接点。而且，“近代”，或者“近代文学”一词，对我们来说，就是“新日本”、“革命”、“青春”的同义词。战后的日本，是继明治维新之后，像被称作“第二次开国”那样，决心再次立足于西欧“近代”的精神原理，重建日本的时代。而这个近代的模范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这一认识也许可以说是我们战后有志于研究中国近代（现代）文学者的特征。

为中国的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成功而感动，认为“真的近代”所

应具有的模式就在中国，并非仅仅是当时在日本尚属少数派的中国研究者，就连跟被称为亚细亚主义者的竹内好相对立、被人们称作西欧主义代表的丸山真男，在当时也曾写道：“在经历过加引号的近代的日本和没有经历过成功的近代的中国，在大众的基础上的近代化这一点上，不如说现在正发生着逆向的对比。”（《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序》，东大出版会，1952年。）

总之，当时，在日本的思想界占有支配性的风潮，是以败战为契机，对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进行自我批判。如果不嫌过于简捷的话，可以说，就是反省所谓的“日本近代”是由上而下的近代化，没有从根本上去学习西欧的近代精神，只是仅仅在表面上模仿其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的伪“近代化”，结果只好归结于侵略战争。可以说，在中国所看到“真的近代的”的“中国像”，成了这种对日本近代进行自我批判的背面。（这个“中国像”，在以后的“文革”和东欧剧变等时期，曾遭到重新的审视，这是以后的事了。）而那时候，描绘这种“中国像”、作为日本近代批判的方法论的代表的，就是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1952年）。

（二）竹内好的“批判装置”与“近代化比较论”

竹内的《现代中国论》，在研究中国的著述中，是一部唯一跨越中国研究的领域、给予当时的思想、文学以广泛影响的著作。之所以他的影响如此之广，是因为这一被加藤周一称之为“竹内好批判装置”的方法论，作为日本近代批判的装置，近乎包罗一切，竹内的方法论既是中国论也是日本论。

我把竹内的方法论归纳一下。第一，他认为“近代”是欧洲的产物，其本质在于“发展”的“精神”。他说：“在欧洲，不仅

是物质，精神也在发展。东方则没有这种精神的自我发展，不，没有精神这个东西。”又说：“在近代以前，儒教、佛教中，有类似精神的东西，但这不是欧洲式的发展；进入近代以后，连这样类似精神的东西也没有了。”

第二，他说：“亚洲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产物”。如何对待那种“强制”（也就是“西力东渐”）；如何接受欧洲对于亚洲的那种不仅是政治、军事方面，还有文化方面的入侵，即各种“文化受容态度”的不同，从而产生了亚洲各国各种不同的“近代”。其中，日本和中国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日本是“转向型（外向型）”，“因为进步而免于陷入悲惨，却堕落”。中国则是“回心型（内向型）”，“因为保守而陷入悲惨，却免于堕落”。“回心和转向，在转变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然而，前者以抵抗为媒介，后者则没有媒介。”在这里，竹内所说的“抵抗”，是指“自我执著”，也就是“一直保持着自我的意志”。

竹内的“批判装置”（即立足于日中比较近代化论的日本近代批判），之所以使我们大吃一惊，那是因为当时论者的多数，都急于指责日本社会的后进性和封建性，而竹内却认为，与中国相比，不访说日本还是进步的，而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个进步性（缺乏“抵抗”）。

竹内认为：日本近代的特征，就在于缺乏主体性。作为日本革新运动的主体的人，“自己不觉得自己是奴隶，而在自己不是奴隶的幻觉中，要把是奴隶的一般国民从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在自己没有被唤醒的痛苦中把对方唤醒。”“（日本的优秀性是奴隶的优秀性）正因为日本具有放弃抵抗的优秀性和进步性，所以视不放弃抵抗的其它东方诸国为后进。”在这里，竹内把亚洲的近代看作是欧洲“强制”的产物，据此，他把日本的进步性（放弃抵抗）和中国的保守性（持续抵抗）的价值逆转了过来。不错，竹

内的“中国像”，是建立在鲁迅与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毛泽东和E. 斯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着中国》中的毛泽东）的连线上的。五十年代前后，正值中国革命处于最辉煌的时期。不妨说，竹内（还有我们）把中国革命视作鲁迅精神的实现。这种“战后民主主义的中国像”，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即使不算误解，但也许过于被理想化了。可是，他的“比较近代化论”（鹤见和子这么称呼它的）的目的，其实，在于日本近代的自我批判这一实践性的问题上（就如下文还要谈到的那样），而不在于纯学问性的中国近代文学乃至思想研究。

第三，上述的那种竹内的“比较近代化论”，今天来看，其更重要的意义是，他从作为日本近代批判的“装置”抽象出来的“中国（=鲁迅）型”这一类型，不仅在日本近代批判中，而且在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亚洲全体的近代化批判中，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

竹内把上述的那种“奴隶”性的进步主义者称作“近代主义”，加以严厉的批判。通常，马克思主义者，把那些不是反革命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称为近代主义。而竹内所说的“近代主义”，是指那种“在身分制残存的后进社会里，把欧洲近代思想作权威引进来时所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在革命前的中国和俄国也屡见不鲜”。换言之，进化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实存主义等等，这些从西方拿来的“思想”，是“近代”的思想，但是，接受这些“思想”的主体一边的精神态度，却仍然是近代以前的“身分制（等于封建制）”，他们把这些近代思想当作“外来的权威”（即以奴隶式的态度）予以接受。这就是竹内所批判的对象。我觉得，八十年代出现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中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权威化（与此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的集团主义）的反思，跟

五十年前竹内对日本近代文化（近代主义）的批判，甚为近似。使两者灵犀相通的，就是鲁迅的思想。

可称得上竹内好思想的关键词的“抵抗”，早就为众人所知，是从鲁迅的“挣扎”一词来的。竹内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到了日本近代文学里所看不到的、主体性的“个”的自立精神，他用“抵抗”一词来体现这种“精神”的本质，认为“真的近代”就在其中。与这样的鲁迅相遇，并以此为契机形成的竹内好的思想（他的对“近代”的理解），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独立、个人的独立以及文学的自律总归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日高六郎语）。不过，当时，我尚未充分理解这一“个的自立”的思想的意义。那时候，正是马克思主义全盛时代，肤浅地把“个人主义”理解为虽非反革命思想，却至少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也没能免受感染。当时，我与其说把竹内理解为是近代个人主义者，还不如说，把他看作是亚细亚主义者、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支持者。

我之对竹内的“独立的思想”的意义进行再认识，是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产生不良后果以及中国的“文革”的实态明朗化之后。（我认识到，这两者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在于它们都是缺乏“个人自立”的“集团主义”。）举个例子。内田义彦（我最尊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说过：“日本并非超近代而残留着前近代，而是正因为它是前近代所以超近代”。他还说过：“是某种东西赋予了日本经济以高度成长的性格，使日本社会跳过近代而实现了超近代。”我就把这些话跟上述的竹内的批评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谈到。

总而言之，以上所述的竹内的“比较近代化论”成了“我的学术史”的起点。它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把日本是先进国、中国是后进国这一认识逆转过来，而是告诉了我，无论是个人也好，

民族也好，其个性不能用比较的方法来决定其高低上下。它使我觉悟到，定谁是先进国无关，只能用先进——后进这一图式“比较”自他这一自己的奴隶性。

（三）“运动”的学术研究与“武器”的实证主义

竹内好的影响不止于我个人，他是给予战后日本思想界以很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不过，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内，或许在《现代中国论》之前、即战争末期的“暗谷时期”出版、战后又再版的《鲁迅》（1944年初版）一书，影响更大些。这本书，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正式的鲁迅研究著作，而且是确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纪念碑。我们这些战后成长起来的人，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从这本书起步的。而且，不妨说，竹内强烈的个性，使从那时起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带上了与其它外国文学研究稍有不同的色彩。

现在考虑一下的话，竹内好的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征（说我从他那儿所受到的影响也许更恰当些），至少有三点。

第一，与本文开头时讲到的有关的某种“文学主义”。经过竹内以及以他为中心而组成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下文将述及）的努力，中国文学第一次从“汉文学”、“支那语”那种特殊的学科环境里分离出来，与其它外国文学一样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取得了跟日本文学共有文艺思潮的“同时代文学”的地位。不过，关于这一点，也应该说是竹内对“文学”的一种信仰。竹内所提炼出来的鲁迅形象的核心，是他从《狂人日记》背后看到的鲁迅的“文学的自觉”。（竹内称之为“类似宗教信仰者的对于罪的自觉”。）下面所引录的竹内在《鲁迅》一书中的名言，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的文学主义：

鲁迅文学的根源，一般称之为“无”。因为他具有这种根本性的自觉，所以成为文学家，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所谓“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只是空话。我站在把鲁迅文学视作赎罪文学的体系的观点上，提出我（对把鲁迅看作是“爱国主义者”的观点）的抗议。

这种文学主义，跟把文学看作与学问、研究无缘的倾向相联系。他也许正是模仿鲁迅批判“正人君子”那样，对学者以及官方的学院主义非常厌恶。其中也包括众所周知的，他不喜欢东京大学。

这种文学主义也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觉得文学是一种特别的东西，在参加学会这种学院式讨论会上“议论文学”的时候，心里总会产生挺滑稽的感觉。结果，一方面产生了某种文人趣味，另一方面与过激的政治主义结合了起来。不过，仅仅是继承了这一点的话，我的“学术史”还不会开始。

我之所以有志于文学研究，是因为认为我不具备成为文学创作者的才能，只能做一个文学研究者。至于说到我们当时受到的竹内的影响，还有“文学主义”的其它方面。

第二，他试图构筑新的中国研究，这似乎与上述的竹内反学院主义的姿态相违背，其实却有着表里一体的关系。他确实讨厌学者，这可称作M. 韦伯对所谓“没有精神的专家”的批判，与上述他在《现代中国论》中对日本的“近代主义（伪近代）”的批判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文学主义”，排斥学院主义的同时，也排斥“花鸟风月”，也成了主张切断文学跟前近代的汉文学以及支那语的关系的“运动”。从上面引录的竹内对同时代的鲁迅观进行的甚为文学主义式的“抗议”本身，实际上，意味着他主张必须要有新的中国文学研究。回顾起来，一九三三年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既是旨在创造新的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运